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品格^{*}

徐 进

【内容提要】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深度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其鲜明的理论品格集中体现为“两个结合”、天下情怀、大国担当与人民性的统一。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两个结合”的标志性成果，既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科学把握人类发展大势，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核心理念，又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正确义利观、和而不同文明观等，实现传统“义利之辩”“名实之辩”“华夷之辩”的新时代表达，超越西方外交逻辑与文明冲突论。习近平外交思想饱含深厚天下情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天下为公”，以全球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倡议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践“立己达人、兼济天下”的情怀，推动经济全球化普惠包容、世界多极化平等有序。作为新时代大国外交的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思想立足大国定位，主动塑造国际格局、引领全球治理变革，构建均衡稳定大国关系与全方位伙伴关系，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同时，习近平外交思想以人民性为价值旨归，聚焦民生、民安、民均，将国内民本思想与世界人民共同福祉相结合，推动实现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与公平正义。

【关键词】 习近平外交思想 四大全球倡议 人类命运共同体 天下情怀 “一带一路”倡议

【作者简介】 徐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大创新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文化根基研究”（2023YZD049）的阶段性成果。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角度来说,所谓理论品格,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本质属性、内在气质和外在表现上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根本特征。与时俱进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最集中、最鲜明的体现,它要求理论必须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发展,始终反映时代精神,回答时代课题。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具有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创新性等特征和品格。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在中国进入民族复兴关键阶段历史进程中,从新时代中国外交波澜壮阔的宏伟实践中产生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明确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品格,对学习研究阐释习近平外交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一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两个结合”的标志性成果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习近平外交思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光芒。它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记载了中华民族从刀耕火种到航空航天生产飞跃和科技进步,也积淀着中华民族从自强不息到化育万物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内驱动力。习近平外交思想植根于中华文化,善于继承并善于创新,回答了时代之问、历史之问、人民之问、世界之问,将中国外交哲学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一) 习近平外交思想创造性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习近平外交思想不仅聚焦当前,还回顾过去,更展望未来,深刻分析和洞察人类社会发​​展轨迹背后的大逻辑、大动力和大趋势,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它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着眼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高瞻远瞩地创造性地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回答了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历史之问。它“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①，宣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责任担当，为我国外交工作提供了更加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习近平外交思想还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准确分析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问题，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观、开放观和发展观等。

习近平外交思想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观察事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过程中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创造性地强调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全局观，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习近平外交思想要求我们，把握世界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就是不仅要看现在世界形势怎么样，而且要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树立正确的大局观，不仅要看到现象和细节怎么样，而且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同时，习近平外交思想还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两个大局的发展规律和相互联系，立足国内，放眼世界，推动两个大局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实现良好的国内国际效应；强调加强战略思维，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变化，准确把握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从顶层设计角度对中长期对外工作作出战略规划；强调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结果，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动权。

习近平外交思想始终坚持实践观点，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视为一种具有高度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创造活动，强调在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通和良性互动中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不断创新外交理论和外交模式，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政策新措施，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实践创新是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习近平外交思想源自实践又指导实践，既是对中国外交实践的高度概括和升华，又是我们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行动指南，是经过实践检验、富有实践伟力的强大思想武器。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全文）》，新华社北京2021年11月6日电。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新时代表达

秉承正确的义利观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国传统“义利之辨”在新时代结出的新硕果。义和利究竟是什么关系？古代先贤有不同看法。孔子认为义为核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应以义制利，以义节利。墨子尚利贵义，主张“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利为本，义利并举。习近平对义利观是这样界定的：“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①这段话表明，新时代的“义利之辨”不是基于小我，而是基于大我，研判的是社会主义“大我”与外部的“大家”之间的关系，核心思想是“孔子改进”，即我们的发展一定是与其他人共同发展、共同进步连在一起的。“义利之辨”对应“全球发展倡议”，通过义为先、义利并举，在思维方式和道德站位上远远超越了西方重利忘义的“胡萝卜加大棒”外交方式，为中国赢得了更多的朋友，为发展争取了正外部性空间。

习近平外交思想回答了“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这是中国传统“名实之辩”在新时代的延续。在儒家看来，“名实之辩”是一个通过“正名”来建立秩序的问题。孔子周游列国，困于匡地，遭难于宋，绝粮于陈、蔡，好不容易在卫国有了一线从政的希望，却提出要先“正名”，子路认为孔子太过迂腐。孔子严厉地批评了子路，并且说出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至理名言。可见秩序的建立从来就是为政之首。2023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指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引领国际体系和秩序变革方向”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之一。这就明确了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改革者的定位，指明中国今后将继续引导和推动世界多极化向平等有序的方向发展。

外交实践要避免有名无实，做到实至名归。名实之间可能有两种脱节，一是名实不符，二是名实背离。名实不符，就是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致；名实

^① 引自王毅：《坚持正确义利观 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外交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载《人民日报》2013 年 9 月 10 日。

背离，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对人对己实行“双标”。中国共产党人信奉“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习近平总书记就曾引用清初思想家唐甄的话“以实则治”^①，还多次强调“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②，不断突出马克思主义重视实践的理论品格。为此，他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号召世界各国携手同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创未来美好世界。

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国家主权等并非毫无约束力的“虚名”，其诞生有着深厚的法理基础，是国际政治理论和现实发展的产物，应予尊重和遵循。比如，中国在提出和倡导“全球安全倡议”后，通过正名和落实两手抓，以全球治理来促进和保障国际安全，在实践上和法理上远远超越了西方“同盟安全”那一套。西方的“同盟安全”将特定国家集团的安全利益凌驾于国际社会共同安全之上，通过拉帮结派搞阵营对抗来挤压他国生存空间，最终只会让全球陷入安全困境，让更多中小国家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而中国倡导的全球安全倡议，以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为前提，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真正把所有国家的安全都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不搞排他性的安全小圈子，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安全，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通过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安全，这正是对全球安全秩序的正名，更是把真正的共同安全落到了实处，给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注入了难得的稳定性力量。

如何摆正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以及各文明之间关系，是“华夷之辨”在新时代的体现。“华夷之辨”原是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关系时产生的一系列思想。中华文明毫无疑问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但在历史长河中也先后产生过“以夷乱华”的担心和“用夏变夷”的主张，而其发展形态“王者无外”则用对华夏文化的认同来达到思想“大一统”的效果。近代以前，中原王朝在文化上是自信的；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结果是发现西方科技竟如此强大，必须“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夷”的内涵和外延都已发生变化。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正式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将“华”扩展为多元混合的众多民族。这时，“华夷之辨”就演化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西方的关系问题。从晚清开始学习西方

^① 《习近平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世界领导人峰会发表书面致辞》，载《人民日报》2021年11月2日。

^②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载《人民日报》2014年3月10日。

先进科学技术到新中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对外开放，中国不断融入国际体系，但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究竟是主从关系、体用关系还是平等交融的关系，国内外各方仍争论不休。习近平总书记对此给予明确回答，世界各文明之间是“和而不同”的关系。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① 将中华文化放在与西方文化平等的地位上，讲明了人类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的重要意义。为此，中国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希望通过和而不同、守望相助的关系建构，在思想境界和胸襟气度上远远超越西方“种族中心论”和“文明冲突论”，为处理新时代中西关系乃至所有非西方国家与西方的关系开启了新的篇章。

二 习近平外交思想具有深厚的“天下情怀”

中国共产党是胸怀天下的政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习近平始终把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联系起来，由此，“天下情怀”体现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以天下共荣为己任，着力推动全人类的共同进步。中国在推进自身繁荣的同时，仍心系天下，着力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与“平等有序”的多极化。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核心理念、战略引领和实践平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四大全球倡议”与“一带一路”都包含了对时代问题的关切，是对人类整体命运与世界发展的深入思考。具体来说，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天下情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原则的明确体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就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提出的“中国方略”。所谓“大道”，是中国始终将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大道施行的标准，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所谓“为公”，是中国不仅考虑一国范围内的利益与诉求，而是从国际社会的整体视角出发，将其视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追求理想社会就要立足于化解人类发展的现实困境，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党的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232 页。

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并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列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①。在具体实践层面,中国积极参与构建平等协商的政治共同体、普惠包容的经济共同体、公平正义的安全共同体、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绿色发展的生态共同体。密切关注贫困、环境、气候、健康等全球性议题,与世界共同分享中国在减贫、环保、碳排放、中医药发展等领域的治理经验。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只有各国合力,才能解决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构成严峻挑战的全球议题。

(二)“四大全球倡议”深刻体现了“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真正的多边主义精神

第一,“全球文明倡议”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共存、交流与互鉴。当今世界,文明间的隔阂、不同思维方式所产生的误解是导致各国间信任赤字、全球治理合作受阻的重要原因。“全球文明倡议”超越了“西方中心”的文明观念,看到了非西方国家在追求现代化、民主化过程中的独特性和自主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倡议各方应尊重各自的文化和文明传统,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第二,“全球安全倡议”提出了包容代替排他、合作代替对抗的非零和新型安全观。倡导以和平对话与平等协商为方法路径,以普遍、共同的安全概念替代狭隘的联盟型安全。包容合作的安全理念使得中国在一系列国际冲突中倡导政治解决,避免局部争端升级,为推动伊核朝核问题解决、阿富汗局势缓和等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此外,中国提出了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并在巴以冲突爆发后,坚持公道正义,以实际行动推动冲突降级。

第三,“全球发展倡议”坚持普惠包容,呼吁尊重不同国家根据国情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与生存方式。一方面,南北差异与发展瓶颈等问题,决定了必须在普惠平衡的原则下弥合全球发展赤字。另一方面,霸权主义主导下的“退群”与“脱钩断链”等现象,造成发展赤字。由此,只有坚持协调包容原则,才能打造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兼容利益需求,实现共同发展目标。

第四,“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五个坚持”的核心理念,聚焦“构建什么样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这个时代课题，力图扭转全球治理赤字不断扩大的局面。倡议点出了国际金融架构改革、人工智能、网络空间、气候变化、贸易、外空等治理紧迫性突出、治理赤字较大的领域，为今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指明了方向。

（三）“一带一路”实践了现代版的“孔子改进”^①

“一带一路”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智慧，成就自己、同时成就他国，“一带一路”的精髓在于，它将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连在一起，它是以中国发展带动世界发展、以中国增长促进世界增长、成就本国同时成就他国的典型范例。这种相互成就体现在权力、器物与制度三个维度。首先，在权力层面，“一带一路”本着普惠包容的精神，关注长期未得到重视的发展中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有助于国际权力结构向这些国家倾斜，帮助其获得更为平等的国际地位。其次，在器物层面，“一带一路”是一种均衡型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结构，其特点在于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合作，而非单向的主导与被主导、控制或被控制的关系。“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工具，实现互利互惠，真正着眼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与经济落后国家的困难与痛点，有效地提高了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缓解了国家间财富获益的不均衡。第三，在制度层面，“一带一路”让更多国家了解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弥补了落后国家在制度供给方面的不足，为其提供了中国模式的可鉴之处。由此，“一带一路”倡议用其十余年的实践历程，印证了中国古人“立己达人、兼济天下”的智慧。

三 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真正的大国外交

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政府历来将中国的外交政策定位为大国外交，始终用世界全局的眼光看待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外交守正创新，砥砺奋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外部环境，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持续作出新的贡献。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此前的大国外交政策相

^① “孔子改进”是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家赵汀阳提出的概念，意思是一人（国）自身福利的提升必须以他人（国）福利的提升为前提，最终实现所有人（国家）共同获益、共同发展。这一概念是以儒家思想对西方经济学中“帕累托改进”的修正。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年版。

比具有显著区别。此前的大国外交是指我国针对其他大国之间的博弈态势制定相应政策以趋利避害，这在本质上是一种“针对大国”的外交政策。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指我国通过外交行动力图塑造国际环境和把控大国关系格局，这是一种基于“我是大国”的大国外交。“针对大国”的大国外交需要在与其他大国博弈时兼顾自主性与平衡性原则，在与其他大国竞争合作中所形成的空间里辗转腾挪；“我是大国”的大国外交则需要主动塑造大国竞合的新态势和于我有利的外部环境，力求让更多的国家站在我这一边，而不是站在我的对立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凸显了“我是大国”的外交特色。

（一）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20 世纪以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一直是世界大国之间激烈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为此，各大国之间曾经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但是，战争、冷战、霸权主义和集团政治都不是解答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以大国领袖胸怀天下的崇高情怀，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长治久安和文明互鉴绘就了蓝图、指明了方向，为回答这个世纪之问提供了正确答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中国外交树起了一面道义的大旗，使最广泛的国家团结在这面旗帜周围，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领导力，有助于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意味着在面对关乎人类前途命运和世界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上，中国外交将始终站在国际道义制高点上，作出经得起实践和时间检验的决断。为此，在国际关系实践中，我们选择和平、反对战争，选择正义、反对强权，选择合作、反对对抗，选择团结、反对分裂，选择开放、反对封闭，选择多边、反对单边，选择互利共赢、反对零和博弈。

（二）构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各国对这一倡议的态度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衡量中外双边关系的晴雨表和试金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秉持开放、包容、非歧视原则，尽管中方反复声明“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同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百花园”，是各方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所有感兴趣的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加入进来，共同参与、共同合作、共同受益，但十多年来的实践表明，一些西方国家不但不会真正参加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还千方百计地以各

种方式对抗和阻挠“一带一路”建设。对“一带一路”倡议真正有兴趣、真正愿意参与进来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的基础，这是中国长期坚持的外交原则。自冷战结束以来，如何让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这个基础更加牢固，一直缺少一个管总的战略规划，“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践解决了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一带一路”倡议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①。我们始终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打开大门，搞“大圈子”和“世界俱乐部”。这个“大圈子”或者“世界俱乐部”的主要成员是发展中国家。由此，“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巩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的关键平台。

（三）积极经略各类关系，协调推进各领域合作

大国关系的发展变化对世界的安全与繁荣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致力于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虽然取得了积极进展，但理想中的格局尚未形成。究其根源，在于中国与某些大国之间以及其他大国之间仍然存在大量难以解决的利益分歧和观念分歧。但是，所有大国都不否认和平、稳定、均衡对于大国关系的重要价值，这就为中国与其他大国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奠定了基础。中国以合作的姿态处理与其他大国关系，致力于超越各国在经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模式等领域存在的差异，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积极推动大国关系实现良性互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国家之间可以有竞争，但竞争必须是积极和良性的，必须守住道德底线和国际规范^②。

构建和拓展大范围、多领域、高质量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外交全方位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中国外交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但是中外关系又不可避免地同时存在利益矛盾与冲突竞争。如何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下妥善处理矛盾、管控竞争、扩大利益、弥合分歧，促进更多国家与我建立良好双边关系，就需要一种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新模式。中国坚持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在发展伙伴关系过程中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不以意识形态划界，倡导不同发展模式相互合作，以增进双方共同利益为基础开展国

① 《习近平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5 周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北京 2018 年 8 月 7 日电。

②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62 页。

际交往，突破了非友即敌、结盟对抗的传统国际关系思维，不仅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实践形式。

（四）致力于解决全球性问题，展现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凸显的时代。面对日益严峻复杂的全球性挑战，推动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是世界各国必须承担的共同任务。由于针对全球性问题的全球治理是一个全球性的责任分担过程，而中小国家在此过程中有较强的搭便车倾向，因此推动全球治理就需要大国承担起主要的全球性责任。当今世界，全球治理是国际规则最密集的领域，而新国际规则的确立与旧国际规则的改革在本质上与国际体系和秩序变革高度相关。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倡导“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应对国际安全问题上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通过加强联合国核心作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通过加强全球安全治理维护世界和平稳定，通过完善全球发展治理共谋全球可持续发展，通过推进全球人权和社会治理共促文明交流进步，通过开拓全球新疆域治理完善未来治理格局，实现了承担国际责任、引领国际体系和秩序变革方向、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三重目标。展望未来，中国将同国际社会一道携手前行，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开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四 习近平外交思想将人民性作为理论的价值旨归

关怀人民、人民为本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基本原则。习近平外交思想以国内民生为基本出发点，同时高度关注与世界人民切身相关的贫困问题、生态问题等全球人类发展问题。习近平外交思想所体现的人民观突破了国家界限，积极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心系世界人民生存与发展。具体来说，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人民性主要体现在“民生、民安、民均”三方面。

（一）“民生”是“执政为民”在外交领域的体现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指导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开创了惠及天下民生的道路。习近平外交思想延续了我国古代政治中“民本”思想的优

良传统,深谙“民富则国昌”的道理。孟子曾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要求统治者要有“忧民之忧”的思想境界,要有解民于“倒悬”的政治作为。2021 年 1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指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①。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重大战略部署,其根本目的即是以内外兼修的新发展格局实现“稳增长、保民生”的重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始终助力其他发展中国家走上利民、富民道路。“一带一路”建设坚持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导向,将资金投向实体经济、基础设施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项目,切实改善了落后国家民众的生存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②,这一表述充分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鲜明的民生属性。

(二)“民安”是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统一

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安”。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安全治理失序的风险逐渐上升。“全球安全倡议”与“新安全格局”两大概念的提出顺应其时,体现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人民和平需求的重视。在国际层面,“全球安全倡议”回答了“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的时代课题。倡议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从人民安全出发,重视生物与化学安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等与人民息息相关的非传统安全议题,强调了为世界人民生活营造和平环境的根本原则。

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在国内层面,“新安全格局”与“全球安全倡议”相呼应。安全是发展的重要前提,只有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新安全格局,才能在实践中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安全需要。国家安全是人民安居乐业的保证,在宏观层面,必须持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营造有利于经济社

^①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北京 2021 年 1 月 11 日电。

^②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87 页。

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在具体实践层面，应进一步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有效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安全问题，有效防范化解可能迟滞或中断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安全风险，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三）“民均”是公平正义原则的中国式表达

真正的多边主义的核心要义是公平与正义，是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在国际层面的实践。首先，真正的多边主义致力于缩小世界贫富差距。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分配不均导致各种矛盾尖锐化，核心国家对半边缘和边缘国家过度剥削，发达国家资本家阶层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底层成为贫富不均的两极。真正的多边主义致力于缩小这一差距，倡导创立更公平公正的国际机制，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抵制歧视性、排他性的标准、规则，倡导构建开放、公平的贸易投资环境。其次，真正的多边主义主张世界人民共享发展成果，通过公平的国际权益实现公平分配，使发展成果惠及人民，不让群众感受到分配不公。2023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了“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这一重要主张，“普惠”正是公平分配利益、惠及全球人民的意涵。在相互依存已无处不在的今天，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原则在中国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思考如何同世界的发展平衡共进，共同做大并公平分好经济全球化“蛋糕”，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都能参与并享有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为实现各国人民的互利共赢和共同繁荣贡献了中国方案。

结 语

习近平外交思想为破解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引领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变革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实现了历史使命与时代潮流的高度统一、民族精神与国际主义的高度统一、中国气派与世界情怀的高度统一，展现了鲜明的理论品格。本文从时代性、全局性、历史性、人民性方面，阐述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品格。这一理论品格的形成，既来自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不断前进的中国外交实践，也来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思维，不仅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根本指导意义，也开辟了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新境界。

（责任编辑 聂保诚）

SUMMARIES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Xu Jin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is a major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resulting from the in – depth integr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the practice of major –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serves as the fundamental guideline for China’s foreign affairs in the new era. Its distinctive theoretical character is epitomized by the “Two Integrations”, the unity of the vision of the world as one,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of a major country, and a people – centered approach, while also demonstrating the qualities of being contemporary, scientific,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As a landmark achievement of the “Two Integrations” this thought creatively applies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materialist dialectics to scientifically grasp the general trends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proposes core concepts such as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imultaneously, it is rooted in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concepts such as the correct view of righteousness and interest and the vision of civilization featuring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 and other concepts, it articulates traditional debates – such as those regarding righteousness versus interest, name versus reality,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States and the periphery—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thereby transcending Western diplomatic logic and the theory of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is imbued with a profound vision of the world rooted in the ancient ideal of “the world for all”, which is fully manifested in the vision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t practices true multilateralism through the four major initiatives –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and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and it embodies the spirit of “achieving success for oneself while helping others succeed and benefiting the world” through the High – Quality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thereby promoting universally beneficial, inclusiv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an equal, orderly multipolar world. Serving as a guide for action in major – country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the thought is grounded in China’s status as a major country; it proactively shapes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leads the reform of global governance, builds balanced and stable relations among major countries as well as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s, and demonstrat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major country. At the same time,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takes people – centeredness as its ultimate value pursuit. Centering on

people's wellbeing, people's security and equitable development for all, it integrates China's people-centered philosophy with the shared wellbeing of people across the globe, and advances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development, universal security, fairness and justice.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Four Major Global Initiative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 Profound All – under – heaven Visio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and the Path to Building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Zhao Long**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rofound shifts in the balance of international power, intensifying geopolitical tensions and security dilemmas, and the compounding spread of global challeng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aces unprecedented anxiety regarding disorder and development, alongside a pressing need for governance. Traditional global governance theories – rooted in Western institutional experiences – struggle with explanatory power and adaptability, failing to adequately address issues concerning the representativeness, legitimac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Centered on core tenets such as sovereign equality,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multilateralism,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and an action-oriented mindset,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explores the foundations of governance legitimacy, value objectives, operational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embodying a unique theoretical lineage and practical logic. Amidst a widening gap in the supply of global public goods, a crisis of consensus regarding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narrative, and rising institutional demands from Global South nations, the Initiative faces both significant opportunities to expand the influence of its concepts and enhance its capacity to shape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constraints arising from inward-looking policies and responsibility-shifting by developed nations, normative competition, and the risks of governance fragmen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t is essential to reshape governance actors and core orientations—shifting from de-statization to re-statization – and to forge a value core that balances efficiency with equity. Furthermore, practical capabilities must be bolstered by transitioning from rule-based governance to action-oriented governance, while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ls that transcend Western-centrism should be explored. Ultimately, by championing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China can systematically enhance its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power.

Key Words: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Build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ultilateralism